



六朝史学与文学

The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 in
Six Dynasties Period

唐志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六朝史学与文学

The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 in
Six Dynasties Period

唐志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史学与文学/唐志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1-29514-4

I. ①六… II. ①唐…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六朝时代 IV. ①K092.35 ②I20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5014号

书 名 六朝史学与文学
LIUCHAO SHIXUE YU WENXUE
著作责任者 唐志远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蒲南溪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51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8.75印张 326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巩本栋

自从鲁迅先生说了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不辨自明的论题了。然而去看看魏晋时代人的自道，却并非如此。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他那么看重文章，举的例子却是《易》《礼》和徐幹的《中论》，与后人所说的文章相差甚远。

在魏晋时期，其实是文史不分的。比如刘劭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人物志·流业》）在刘劭看来，能著书立说，就是有文章之才，而有文章之才，就可修史。所以，他举的能文的代表也就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可见文史在当时并未区分。再如，三国吴右国史华覈称赞薛莹有史才，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悽悽为国惜之”（《三国志·吴书·薛琮传附薛莹传》）。既说薛莹“文章尤妙”，又说“记述之才如莹者少”，可见这里所说的“记述之才”，即史才也就是能文的重要标志。显然，文史不分，文也就不能说是自觉了。

文与史的自觉，大约要到南朝的刘宋时期。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文学与儒、玄、史分立，反映出时人对文史各自特点的认识。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是喜欢把文史合在一起论述。像《宋书》里记载，“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王惠传》）《南齐书》载王僧虔“好文史，解音律”。（《王僧虔传》）《梁书》谓周舍有学问，“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周舍传》）《陈书》称岑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岑之敬传》）南朝陈史家姚察说：“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书·江淹传》）北朝颜之推又说：“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颜氏家训·涉务》）尤能见出自汉以来文与史的这种将分犹合的复杂关系。

汉魏六朝时期文与史天然具有的上述亲缘关系，吸引了后世的众多学者

的目光：“文”如何影响“史”？史学的繁荣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文史互渗、交叉演进的轨迹又应如何勾勒等等，都是耐人寻思的重要论题。门人唐志远博士数载于兹，孜孜矻矻，旁搜远绍，寻绎爬梳，沉潜有得，撰为此书，所获实多。他对各类史料的熟悉、对问题认识的透彻、对作品感悟的深刻以及对文字驾驭的得心应手，都令人欣喜！

文与史的或分或合，彼此影响，在文士们的大多数的撰述中，都并未有明确的表述，而是隐含在纷繁的史实或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要寻绎其间的关系，需要从大量的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入手。书中无论是讨论《三国志》裴松之注、沈约《宋书》，还是其它史书所受文学的影响；无论是论述荆湘地志还是《高僧传》的文学色彩，对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都是如何处理这似乎浩渺无际的史料。志远读书素来勤奋，他从散见于史注中的大量的案断文字，从所征引的众多美文，从志怪小说、杂传史料的采入和史学批评的论述中，分析归纳裴松之的文史观念，指出其一方面主张真实，反对虚妄，另一方面又追求采藻，反对质木无文的倾向，当是受六朝文学影响的结果。从沈约《宋书》所征引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从其所感兴趣的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揭示沈约史学和文学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从荆湘地志中各种纷繁的民间传说和歌谣，论六朝地志的文学色彩。又据《高僧传》所引书札、诗歌、偈颂、谣谚等琐屑的文学文献，展现僧传所受文学影响的印记等。其披拣文史资料，细加排比归纳，所论切实可据，显示出他对相关史料文献的谙熟和驾驭这些文献的能力。

有时候，他对文献的运用并不体现在正面的论述中，而是表现在随文的注释里。例如他论《三国志》裴注的文学色彩，正文引《魏书·崔林传》裴注对孔子的推崇，注释引《晋书·裴秀传》《南齐书·裴昭明传》，以明裴氏家世业儒的思想渊源。论六朝人以文艳与否衡文，注引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载陈寿“属文富艳”事，反映当时的文史观念和社会风气。论沈约《宋书》的文学性，正文引其《氏胡传论》，注则进论沈氏文字出于贾谊《过秦论》，并引《宋书·范晔传》《梁书·裴子野传》等，认为六朝人多以贾谊《过秦论》为写作范式。论阮籍《首阳山赋》，注引阮瑀的多篇关涉伯夷、叔齐的诗文等等，皆是其例。昔钱穆先生谈到学术论文写作中正文与注释的关系，谓：“正文中有许多枝节，转归入附注，则正文清通一气，而附注亦见精华。必使人读每一条注语，若条条有所得，则爱不释手，而对正文弥有其胜无穷之感。”（《（与余英时）论学书简》）志远此书近之矣。

与对史料文献的熟悉联系在一起，也更为重要的，是对史料意义的挖掘和认识。志远读书既多，融会贯通，往往能有所发明。比如他讨论《异物志》

的源头,指出记载草木虫鱼鸟兽的渊源,可追溯到《山海经》及类似著作,而记载民俗风情,则应溯源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异域传。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六朝《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使之表现出“异彩纷呈”的美;而后者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所论皆言之有理。再如,他论六朝的《高士传》,认为儒家在思想资源、隐逸典范乃至叙事模式上,都对《高士传》的形成和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理应与道家一样,看作六朝高士类杂传的思想渊源,其影响甚至还在道家之上。这也是有识见的看法。由此入手,他通过文本的细读,进一步深入考察了嵇康等人尚友古人的心路历程,指出,嵇康的诗文体现了其世路的艰难,知音的难遇,因而欲抗心希古、尚友古人的历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嵇康信奉道教之求神仙,并且身自服食,躬行不殆,可他从高士所受的影响偏重于精神超越,而非肉身之不死。这也是他的夫子自道里只提到老、庄、台、尚等,而没有涓子的原因。进而,志远怀疑嵇康的求神仙是否出于真心的选择,抑或别有其用心。因为在其《赠秀才入军诗》中有云:“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揽辔踟蹰,仰顾我友。”其兄嵇喜之答诗则谓:“列仙徇生命,松乔安足齿?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己。”两相对照,知二者当是相酬答之词。观嵇喜诗意,实在是批评其弟不该仿效松乔的求神仙,而应该与时变化,委运任命,大有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意味。嵇康的思想境界似乎不应该不如其兄。此外,与之同时的阮籍、向秀等人也不信神仙之事,可为旁证。故这种推论是很有道理的。就中尤其是对嵇康、阮籍和陶渊明隐逸心态的分析,颇为精到。他以为嵇康等人的性情及处境不同,他们对高士的取舍也会不一样。嵇康向往的是老子、庄子、尚子平、台孝威等人的超凡脱俗、遗落世事;阮籍更多地效法渔父、四皓、河上丈人的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相对而言,陶渊明的态度稍为复杂,他一方面通过许由、四皓、扬雄等高士表达其忠义悲愤之慨,另一方面又借助颜回、长沮、桀溺、荷蓑丈人等坚定其安贫乐道之志,并且身体力行地谱写了一曲高士之歌。受此不同取向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各放异彩,使后人不得不钦佩于嵇康的清旷高远,同情于阮籍的抑郁无聊,也亲近于渊明的平和通达。他的这些论述,能从《高士传》接受史的角度来考察六朝文人和文学,无疑带给学界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其它如认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志怪小说,主要还是以备异闻,六朝《高士传》中的四皓传对《桃花源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影响,左思《三都赋》的征实写法,受到史学实录精神的熏陶等,也都是有见地的。

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提出:“颂其诗,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由读古人之诗书，进而上论其行迹，与古为友。志远著书撰文，颇能得古人之意。他说嵇康的文章，“便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率性直言，无多雕饰，至今读来仍觉光明俊伟，如见其人”。又说读阮籍的作品，论其诗文与高士之间的深层关系，便“一同感受着他的辛酸、凄怆、忧惧和痛苦，这些都是过往的圣贤高士们所无法救度的。他的人生在在都是矛盾，他的诗文也因之而隐晦曲折、欲言又止，‘反复凌乱，兴寄无端’，‘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我们佩服于嵇康的超凡脱俗、遗落世事，如松之贞，如雪之洁，高不可及；但我们更加同情于阮籍的忧愤深广、沉郁顿挫，‘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令人黯然神伤”；“鲍照所谓‘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踟躅不敢言’，堪为阮公一诵。人但知哀莫大于心死，而不知痛莫大于心未死也”。他讨论陶渊明，引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集序》之言：“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以为文章的收束，“并借申其企慕景仰之情云”。志远所试图揭示的，正在于嵇、阮、陶等人皆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关心民瘼的淑世情怀，身处魏晋六朝之离乱多事之秋，其所虑不仅在安顿自身的灵魂，更承继和发挥着中国古代士人历来以道抗势、激浊扬清的社会脊梁的作用。无怪读志远此书，总让人能感受到他那种强烈的淑世情怀和忧患意识。今之治学者，不应如此乎？

湖湘学术，自南宋胡宏、张栻发端，朱子称之曰：“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纯粹、志趣确实者。”（《与曹晋叔书》）至晚清，更涌现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志远是湖南宁乡人，十年前负笈金陵，三年学成而归，今在湖南大学文学院工作有年矣。其优游徜徉于湖湘和东南学术之间，远绍近承，可以相信，在学术的道路上，将走得更好更远！

戊戌暮春于钟山东麓有容斋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	(9)
第一节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与文学	(10)
第二节 《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	(18)
第三节 六朝其他史学批评.....	(30)
第二章 六朝正史与文学	
——以沈约《宋书》为例	(38)
第一节 《宋书》之本文	(40)
第二节 《宋书》之征引	(47)
第三节 《宋书》与文学批评	(56)
第四节 《宋书》与文学活动	(65)
第三章 六朝地志与文学	(75)
第一节 六朝荆湘地记与文学.....	(75)
第二节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98)
第四章 六朝杂传与文学	(119)
第一节 六朝《高僧传》与文学	(119)
第二节 六朝《高士传》与文学	(145)
第三节 六朝《高士传》之接受	(171)
第五章 魏晋文学与史学	
——以左思《三都赋》为例	(228)
第一节 《三都赋》征实之理论	(228)

第二节	《三都赋》征实之表现	(230)
第三节	《三都赋》之征实与史学	(232)
结论		(242)
附录	汉魏六朝文史杂论	(246)
第一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新探	(246)
第二节	论晋代史学的简约之风.....	(255)
第三节	阮籍《咏怀诗》揭示的人生困境.....	(262)
第四节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玄学分析.....	(268)
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9)

绪 论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①。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为止,其间三百多年,战乱频仍,烽火连天,却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②金毓黻先生也说:“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竞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明之果。”^③沈刚伯先生指出:

东汉之后,自三国一直到隋朝,是一个大变而特变的时代。不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社会上,因外国民族之移入而使我们在种族融合方面发生大的变动;而且学术思想也因佛教之东来与玄学之兴起,而起了很大的变化。加以经济上的发展,与海外的扩张,都超越前代。这种新文化解放了个性,注重到实用,使当时的学人们,一方面吸收并融汇外来的文教艺术,一方面更勤于搜集同整编旧有的典章图籍,于是乎史学的发展,乃突过前人。^④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史学呈现出几点鲜明的特色:

第一,六朝史书数量非常大。班固《汉书·艺文志》反映西汉以前文献状况,其中史学著作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只有《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卷。至唐初魏徵等修《隋书·经籍志》,

① 关于六朝,有两种不同说法:就王朝而言,主要指三国之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个朝代;若以时代论,则指起自三国,终至陈朝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考虑到南朝接续魏晋之文化传统,绵延不绝,而北朝更多地继承两汉,且其在史学上无多新变,故本文所称之六朝大抵对应于魏晋南朝。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逯耀东先生指出:“每一个动乱的时代,由于知识分子为了寻求自我的存在,他们特有的时代感情,势必激起他们对历史的探索。中国的史学黄金时代在魏晋与两宋,而非汉唐。明末真正的史学家,却隐于危亡之际泣血著述,所以世变方殷之日,正是史学创作之时。”参看氏著《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页。

③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④ 沈刚伯:《拓垦者的画像:史学与世变》,收入《沈刚伯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特立史学一部^①,其所著录存于唐初的史学著作,共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加上唐初已经亡佚的史书,计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较之汉志,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真可称得是洋洋大观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时期社会动荡,文献散佚严重,《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文献并非史书的全貌。单就杂传而言,清人姚振宗就补出书目二百五十一一种之多^②。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③。观此二者,可思过半矣。

第二,六朝史书种类非常多,呈现出“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的新局面^④。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分史书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隋书·经籍志》经过调整,分史部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以杂传类为例,又包括了人物总录、地方人物、高士隐逸、孝友、忠良、名士、文士、儒者、家传、幼童、妇女、名僧、仙道、鬼神怪异等多种类型。体例之多,堪称空前^⑤。

第三,六朝史学理论发达,史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胡宝国先生指出,除了继承前人的评价标准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对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对条例、史论的重视,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对编年体、纪传体体裁优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现的史学批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也日益重视。”故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⑥赵俊先生则分别从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研究的范围、著史态度、家学承继、治史特点、文质关系、编纂体例等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的特点,并指出:“在扼要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的成就之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

① 《隋书·经籍志》云:“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周一良先生总结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首先就是史部著作之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参看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②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〇,《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又可参看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③ 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另,梁阮孝绪《七录》记传类所收史书,达到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较之汉志,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余倍,比稍晚的唐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就要多出不少。

④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72页。

⑤ 沈刚伯:《拓垦者的画像:史学与世变》。

⑥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7—238页。

史学批评之繁荣发达,魏晋南北朝实为关键发展阶段。”^①

第四,六朝史学风气浓厚,史书的撰写者身份极为多样,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隐逸之士,多热衷于写史^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谈的是曹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创作实绩和号召力量,事实上,他们在史书的写作上也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魏文帝曹丕以帝王之尊,崇讲学术,撰著史书,开创前所未有的风气。其《典论·论文》自称“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所著《列异传》三卷,录于《隋书·经籍志》。他的弟弟曹植虽以文学名世,也有撰史之志,如其《与杨德祖书》所云:“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至于南朝,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等,皆曾撰史。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响所及,遂至一般文人皆有志于史学。

除了上述史书数量大、种类多、史学理论发达和史学风气浓厚之外,六朝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如刘节先生所言:“这个时代的史学界有一种特殊风气,与汉代以前固然不同,与隋唐以后也大不相同,我们讲史学史的人,必须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讲出来,才可以说是完成任务。”这个特殊风气便是该时期的史学家大多兼是文学家或玄学家,正像孔稚圭《北山移文》里所说的:“既文既博,亦玄亦史。”^③六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现在可考的有六十多位,这些人中以文学家或玄学家而兼史学家的,就有不少,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云:“其有才堪著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如陆机、谢灵运、沈约、江淹等,皆是佳例。

中国古代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文学与史学之间常常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其在文学和史学分别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六朝时期^④,这一点表现

① 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又可参看氏著《〈史通〉理论体系研究》第一章第三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第57页。

③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03页。吕思勉先生也批评说:“其时史家,好法《左氏》,实则与后世平话,同一白科耳。其不足信据,固无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饰,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则知幾《史通》,固已深讥之矣。”见氏著《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④ 钱穆先生指出:“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有两种新的学问,一是史学,一是文学,于是乃有经史子集之四部分类。”参看氏著《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7页。又可参看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

得尤为突出。“吾国文史之学,以魏晋南北朝之世为极盛。”^①六朝史学既如此兴盛^②,不能不对当时文学产生相当之影响。同样的,六朝文学的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巨大辐射力,包括史学在内的各种学科无不受到当时文风与文学思潮的熏染。那么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史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六朝文学、史学乃至六朝文化研究之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就目前之学术状况来看,不论是六朝之文学还是史学,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④。其中六朝传记文学之研究,牵涉文学和史学两大领域,呈现出比较兴盛的局面。单就传记文学史而言,就先后出版了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53页。

② 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是历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如蒋家骅《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载《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石荣伦《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载《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等文。台湾地区则有杜维运《魏晋南北朝的衰乱与史学的极盛》,载《国史馆馆刊》复刊(21);罗运治《魏晋南北朝史学蓬勃发展因素的探讨》,载《淡江史学》(10)为代表。杨惠如先生综合诸家见解,归纳为八点:经学的急剧衰微;史官制度的完备与“史官失其常守”;史学、史家与史书撰修的受重视;政治、社会、经济等大环境变动的刺激;政治社会的安定繁荣;纸笔等文化工具的进步;对《史记》《汉书》的仿效与研究;豪门世族需要史学为之服务等。参看氏著《1950年以来两岸三地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究》,载台北:《景女学报》(二)2002年1月。

③ 杨惠如先生在总结了近五十年来两岸三地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状况之后,指出:“就前揭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的六个论题,并透过史料的‘占领’与深度解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究应该还有许多讨论与发展的空间……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亦是一个重要课题。史学、经学、文学、玄学四者之间的交会与各自发展都仍有研究空间。”参看前揭《1950年以来两岸三地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究》一文。

④ 就文学而言,可以参看洪顺隆主编的《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修订版)、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及《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综述性著作。就史学而言,以史学史著作为例,就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2000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以及日人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专论六朝的则有邱敏《六朝史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都对六朝时期史学的观念、特征、演变等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讨。

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多种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六朝之史学著作。专书研究则有段法雷《范曄〈后汉书〉传记艺术特征论》(浙江师范大学 2002 年硕士论文),程方勇《范曄及其史传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 年博士论文)、钟书林《〈后汉书〉文学论稿》(陕西师范大学 2007 年博士论文)以及李敏《〈宋书〉的文学价值》(湖南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郭晋《融文心入史心——略论南朝人所撰三部史书的文学特色》(苏州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等^①,分别对范曄《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史书的文学特色进行了探讨。非正史类著作较早的研究当推朱东润先生,其《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试图系统总结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和特点,认为汉魏六朝的别传和僧传成就最高,并对此进行了论析^②。晚近之研究则可以熊明《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辽海出版社 2004 年版)和朱静《魏晋别传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为代表,前者深入探讨了杂传的概念、分类、兴起、发展、文体特征及小说化倾向等问题,并梳理了六朝杂传与唐传奇的渊源关系^③;后者则探讨了魏晋别传繁兴的原因,并对其史学价值和艺术特点进行了论述。总的来说,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历史文献,探讨各朝史书之文学特色,而很少注意到六朝史学与文学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张亚军的《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算是对先前史传文学研究的一种突破,即不是探讨史传本身的文学特点,而是“对南朝四部正史当中所呈现的文学面貌进行分析和梳理,考察在官方史学家的眼中,文学究竟是怎样被描述、被反映、被评判的”,角度比较新颖,所论如六朝时期文学与史学的分离“并不是瞬间的清晰的决断,而呈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牵连;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史学之间也毋宁是一种有机互动而又相互渗透的关系”等,也比较宏通,颇有启发性。

从宏观上探讨六朝文史之关系的论文,则有李少雍《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载《文学遗产》1996 年第 2 期)一文,探讨了古人的文史观念,比较系统

① 此外尚有台湾学者林丽娥《范曄之文学及其史论》一书,为撰者于 1982 年自印,参看前揭《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

② 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据陈尚君先生为作后记可知,此书写定于民国三十一年即 1942 年 5 月,是朱先生四十六岁时的著作,完成于他一生学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

③ 程千帆先生在《史传文学与传记之发展》一文中指出:“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应是较早关注六朝杂传之特色及其与唐人小说之关系,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而已。参看氏著《闲堂文藪》,齐鲁书社 1984 年版,第 162 页。又可参看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 年第 6 期。

地梳理了文史之间的分合、联系与区别等,以之作为“史传文学概论”^①。王东《从学术传统看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3期)认为:“就史学与文学这两大知识门类来看,无论是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两者间的关系既呈现出划然可分的边界,又往往相互含摄、彼此纠缠。”张丽《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分野》(载《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指出:“文史分野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间历经反复,但各自独立并最终分道扬镳,确实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而言,郝润华的《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的讨论更为集中。其认为六朝史学在取得独立地位与特征的同时,又与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分别从史家身份、史书语言和史书征引文学作品等方面,谈了文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与之相应的则有陈传万《南朝史籍编纂的文学意义》一文(载《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从正史列传中收入文学作品、杂传创作的兴盛、史籍里有关传主的文学观念论述的记载、很多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等方面,就南朝史籍编纂的文学意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虽然篇幅无多,但也提示了一些条例,颇有参考价值。然这些论文在追求宏大叙事的同时,并不能兼顾具体和深入,六朝文学和史学之关系,还有待进一步之研究。

以上所论皆为文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史学研究著作同样涉及六朝史学和文学之关系,而且因其关注点不同,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的《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认为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史学慢慢脱离经学走向独立,因之出现了一系列新史学写作形式。该书集中探讨了杂传、别传、志异小说等兴盛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性格,虽然局就魏晋一段而言,可是往往推溯源流,辨章学术,对笔者启发甚大。胡宝国先生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与逯先生的著作可谓桴鼓相应,其中如文史之学、史论、杂传与人物品评、州郡地志等章,都涉及六朝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所论魏晋史学与南朝史学因皇权控制之强弱而产生差异;只有史学和文学划清界限,史学才真正独立;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等观点,都能从宏观上把握六朝文史之发展,足以开阔视野。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第八章谈六朝史学与文学、玄学的关系,指出“魏

① 另外,李先生还先后发表了《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姚氏父子的文笔与史笔——读〈梁书〉〈陈书〉札记》(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史传里的琐事记载——〈晋书〉文学特色胥说》(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文胜质则史”——关于〈晋书〉的文学语言》(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等论文,在此领域做了一些辛勤的耕耘。

晋南北朝的前期史籍,其文章风格渊源于《史记》……自从荀悦、杜预以后,作史者模仿《左传》的就很多了”;并对六朝史籍“排偶之什,纷然杂陈”的风气进行了批评。蒙文通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探讨了六朝史家对骈俪文风的批判和反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到六朝时,认为“比经学更早发生变化的是史学,这种史学的变化又是随着文章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以类书的出现、史学的古文复兴等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证。

总而言之,前述史传文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史学著作,很少关注史学对文学的影响;部分论文注意到了文学和史学的相互关系,但是格于体例,限于篇幅,往往缺乏具体和深入的研究;至于逯耀东、胡宝国等先生的著作,在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也仅对魏晋杂传、别传、州郡地志等进行探讨,难以反映六朝史学之全貌。故我们认为六朝史学与文学之关系还有不少发掘空间和研究余地,本文拟在已有研究之基础上^①,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把重心放在文学和史学二者之关系上,择取六朝时期最有特色的一些史学门类及其代表性著作,联系时代背景,进行细致和深入的辨析,力图得出平实而可靠的结论。

六朝史籍虽然很多,其散佚也非常严重^②。据清人章宗源、姚振宗各自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可知,在唐人修《隋书·经籍志》著录六朝典籍时,便有大量的典籍不复存在,时至今日,更仆难数。因此本文拟从目录学出发,细读《隋书·经籍志》和清人徐崇、侯康、姚振宗、丁国钧、文廷式及近人聂崇岐、陈述等各种补艺文志^③,比较全面地把握六朝史籍之种类和数量及其存佚情况,充分利用现存六朝史书和清代以来的辑佚材料^④,钩稽爬梳,排比类列,建立起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全文拟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考察,即观察六朝史学批评怎样受到六朝文学之影响。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兼有史注和史评之意,是对魏晋史学的一大总结,具有承先启后之意义,因而其史学批评也最有代表性,故此部分即以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为例,并且旁搜远绍、上下求索,探讨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之关系,为全文的展开作铺垫。第二

① 以上所论只是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具体到某一种史学著作,其研究专著和论文必不在少数,本文各章都对此有所综述,可参看。

②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提出“五厄”之说:一为秦始皇之焚书,二为西汉末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南朝梁末魏师入郢。其中最后两次就与六朝典籍之散佚有关。参看《隋书·牛弘传》。

③ 参看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等,《二十五史补编》本。

④ 参看孙启志、陈建华《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